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3001

“纠结”的写作暨心理现实主义的新创获 ——再论阎真小说

杨经建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阎真小说将现实性品格、审美当代性诉求建基于叙事心灵化机制, 并寻找与其相应的审美言说途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 据此书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忧思录。阎真从“纠结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落笔, 以“纠结”为创作构思的内驱力和审美思维的支点, 在剖析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上表现出独特魅力。“纠结”还是阎真小说文本叙述的元话语, 一方面叙述依赖“纠结”来展开, 情节凭借“纠结”来演绎; 另一方面“纠结”又被用来设置性格相反相成的人物对应结构, 读者可以通过“纠结”的人物去透析当今的社会心态和时代情绪。尤其是, 阎真将自己的创作整体性置于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求索中, 这使阎真小说在心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 带给当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颇具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 阎真小说; 心理现实主义; 纠结; 当代知识分子; 心灵化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3-0001-07

Writing of “Entanglement” and New Creation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 Re-Discussion on Yan Zhen’s Novels

YANG Jingj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Yan Zhen’s novels are based on the narrative spiritualization mechanism of realistic character and aesthetic contemporary demands, and seek corresponding aesthetic discourse channels-psychological realism novels, based on which he writes the spiritual concern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entanglement is a common mentality among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Yan Zhen employs “entanglement” as both the driving force of creative conception and the pivot of aesthetic thinking, demonstrating unique charm in analyzing the survival and spiritual state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Entanglement” is still the meta-discourse of Yan Zhen’s novel text narrative. On the one hand, the narrative relies on “entanglement” to unfold, and the plot is interpreted through “entanglement”; On the other hand, “entanglement” is also used to set up a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with contrasting personalities, allowing reader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ocial mentality and emotions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se “entangled” characters. In particular, Yan Zhen places his creative integrity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 and literary exploration, which makes his novels

收稿日期: 2024-11-05

作者简介: 杨经建, 男, 湖南浏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uniqu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new and beneficial insights for current realism literature.

Keywords: Yan Zhen's novels; Psychological Realism; entanglement;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spiritualized narrative

阎真多年来执着于长篇小说创作,至今已出版发行5部作品。其中的《沧浪之水》“风行二十年,印刷上百次”,不但在文学界声誉甚高,社会影响也非同一般。鉴于5部作品都以四字命名(《曾在天涯》《沧浪之水》《活着之上》《因为女人》《如何是好》),且都贯穿着思想探询和精神追索的主线,不妨称为“四言题系列”。不难发现,阎真小说(以下相关引文都依据小说初版本)擅长于心灵化叙事,通过心理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省察人的精神生态和思想困惑,同时又借助个人命运和精神创痛将心灵化叙事的省察外化为社会层面的伦理价值诉求。之前,笔者曾多次撰文评论阎真小说,但总觉意犹未尽。缘于此,本文拟针对其小说的“纠结”症状,系统探析阎真的心理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和文学求索。

一、心理现实主义:寻求合适的审美言说途径

阎真小说无疑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如其自我陈述:“作为一个作家,我是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写出生活的真相是我的最高原则,其他的考虑都必须让位于这个原则。”^[1]从文学发展实际来看,现实主义并非封闭的话语体系,而是敞开的、具有广阔延伸度的文学传统、审美原则、创作范式、诗学观念。“归根结底,现实主义是一种体现在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中的艺术精神。”^[2]阎真的《活着之上》之所以荣获首届“路遥文学奖”,缘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活着之上》中进行了一次完美重归”^[3]。这意味着阎真小说所呈展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路遥小说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当然,与路遥式现实主义相比,阎真小说的现实主义有其独特之处。

路遥小说体现出来的是传统现实主义本色,正如有论者所说,“路遥的现实主义之‘传统’来

自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已成学界共识。……柳青作为路遥的文学前辈,可以说是路遥文学创作之‘传统’最直接的来源”^{[4][24]}。谈论路遥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考察传统现实主义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中的命运,觉察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兴。路遥以充分的写实原则与叙实精神,调遣其丰厚的生活体验和文学积累,再现了与现实主义书写相对应的中国改革初期的社会现实,其创作充满了创作激情和道德热情。路遥小说“除了已经经过洪子诚充分阐释的‘一体化’特质外,另一个应该说就是构成路遥小说情怀最动人部分的‘公共文本’特质了”^{[4][25]}。正如路遥本人在《平凡的世界》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中所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5]如此,路遥小说才能承续并光大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对问题进一步审视可发现,现实主义文学大致可分为两个创作取向:一是写实型现实主义,如传统现实主义;二是心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堪称极致,中国现代作家鲁迅、路翎的小说则是本土化范本。“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是心理小说的一个类别。它继承与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把客观的现实心灵化,主观的心灵对象化,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精细分析,反映社会精神演变的现实,显示了有别于现代派小说的艺术特色。”^{[6][165]}传统现实主义与心理现实主义之区别,也是路遥小说与阎真小说区别之所在。

在阎真看来,只有投入并沉入到平民化世界中,亲历且体验其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借助他们去摹写世间百态,描绘人间真情,才能写出生活质感和生命痛感,穿越生存表象而直抵存在本真,在对“此岸”关注中蕴含“彼岸”关怀。阎真以平视角度表露其平民情怀,平民大众的“世俗的生活,就是真正的生活,需要积极投入其中,

而不是对抗的生活状态。”^[7] 阎真把这种置身其间、情感与共的写作方式称作“贴地而行”^[8]，他的创作也因此强调客观现实细节再现的同时，更注重对现实生活进行心理分析与精神思辨，这就为他所追求的现实主义带来了诗性提升与思想深度。

不仅如此，阎真还强调：“《沧浪之水》、《活着之上》，在叙事上没有激烈的、外在的矛盾冲突，也没有矛盾冲突的主要线索，这种冲突表现在人的内心，所以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心理小说。”^[9] 阎真凭借“心理小说”来激活一种阅读的实感体验，再在“实感”基础上寄寓其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求索，成就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忧思录。

笔者认可《活着之上》在荣获“路遥文学奖”时身为评委的萧夏林先生对阎真小说的判断：“彰显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绝对力量。”^[10] 的确，“作为新时期中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11]，从阎真小说中可以读出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新历史话语的融合。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是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那样对既有的一切予以摧毁，先“破”后“立”（其中主要是“立人”），在破坏旧有中获得新生，而是对既有的一切带着敏锐警觉和深切忧思，在疑虑和质询中洞悉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预示社会变化、发展的诸般可能性，以文学形式回应时代的思想难题和精神命题。其次，也许是与个人的气质秉性有关，阎真不是像鲁迅那样采取激进主义的态度立场——“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绝望地彷徨于“无物之阵”，在悲愤中毅然地向“坟”走去，即使面临“绝望”也要进行“绝望的抵抗”；而是体现出批判理性与建构意识之间的互指性对应，其批判姿态是温和、宽容、通融的。他主张以审美形式来表达“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旨在对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进行想象性重构。这样的想象性重构在其小说中则是以“责任和良知”^[12] 为核心话语的道德理想主义，即如《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13] 之申明。阎真的创作自觉承担了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重塑的历史使命，体现出智慧和承担的融合，因而其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多了一份理智而少了一份激情。

不难发现，阎真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虽然也直面

惨淡的人生，在忧虑中默认现实性生存状况，但也正是出于一种看透生命存在局限性的忧虑，他们仍然在心灵深处坚守着仰望星空的执念。客观的人生、世态和主观的意念、情感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其小说“在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把客观的现实心灵化，赋予客观性因素以主观的形式，把主观的心灵对象化，使主观性因素更具客观的特性”^[14]。这种创作取向本质上与心理现实主义一致。

实际上，被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鲁迅同时又是一位心理现实主义作家。“当鲁迅……等作家将主体自我对生命独特、深切的体验和感受渗透于小说……他们就趋于从无限复杂的个人知觉上去观照主体的心理世界，创作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15] 似乎可以说，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还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阎真的小说创作与鲁迅的小说创作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纠结”：价值选择的困惑及其文学转述方式

“阎真的小说中没有宏阔的历史场景，也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完全依靠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隐蔽地传递自己的哲学观念，获得叙述的深度。”^[16] 这种“获得叙述的深度”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有赖于一种“纠结”的写作形式。

阎真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当代知识分子，而“纠结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17]。如果说，阎真认为自己的小说“在叙事上没有激烈的、外在的矛盾冲突，也没有矛盾冲突的主要线索，这种冲突表现在人的内心，所以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心理小说”^[18]，那么，表现“当下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的“心理小说”以“纠结”为创作构思的内驱力和审美思维的支点，是顺理成章的。据此，阎真小说的心灵化叙事可以这样表述：揭露一个心理症结→叙述予以解释→人物的行为方式。不言而喻，所谓心理症结指向的就是阎真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纠结”——人与社会、时代之间，人与历史之间（对古代先贤无比敬仰，却又只能远敬难以近效），人与人之间不同价值观的“纠结”。说到底，“纠结”是人所选择的价值观在自己跟自己“纠结”。可谓“纠结”不止，心灵的撞击越甚，精神探询越深。在此意义上，“纠

结”更是一种认知话语和思维方式,它在深刻剖析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在“纠结”中,阎真笔下的人物“想遗世独立般地清高或潇洒又往往有些不甘,欲同流合污地妥协或堕落又每每颇多顾虑,做不彻底。于是,只好在污泥中翻滚,为染与不染而时刻纠结,在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之间徘徊,让心在清高与向世俗妥协间挣扎不已”^[15]。这既是阎真对他们心路历程的幽微体察,也包含了对他们存在状态的深刻体悟;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症候也于此水落石出。在此,叙事的完成依赖于心理动机。质言之,“纠结”无异于阎真小说创作构思的内驱力和审美思维的支点。

有研究者将“纠结”视为阎真小说的叙事策略,其典型的体现是“对话”。“对话”分为两类:一是池大为/聂致远与妻子之间的“对话”。其可视为两种不同层面的“自我”,前者代表精神层面的“自我”,后者代表物质层面的“自我”,两者之间的“对话”就具有自我“辩驳”的意义:妻子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现实意义上无可辩驳,因为它涉及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池大为/聂致远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在精神意义上无可置疑,因为它关乎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二是池大为/聂致远内心两种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一种声音呼唤他按照现实生存的逻辑行进,一种声音呼唤他追寻生命的精神价值与终极意义,其致使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矛盾与辩驳成了贯穿于文本叙事的基调。每当在现实中出现不同道路、不同行为的抉择时,这两类声音就会出现激烈的交锋,从而暴露出池大为/聂致远复杂、矛盾的意识特征和性格的双重性,也突显了当生存和精神产生冲突时主人公“纠结”的心态^[16]。

笔者以为,“纠结”不仅是阎真小说的叙事策略,更是其心灵化叙事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关心什么样的心理困境,小说就呈现什么样的叙事之道。阎真小说中人物的“纠结”,颇似哈姆莱特的犹豫和延宕:敏于思索而拙于行动,决心行动而又不知如何行动,从而陷入行为的无意义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之间的焦虑,发出“生存还是毁灭”的呼喊。在阎真小说中,“纠结”为人物的精神追询和心灵探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文学也在“纠

结”的心灵对话中获得了意义张力。一旦“纠结”缺位,阎真小说的心灵化叙事就失去了内驱力。可以说,人物无尽的“纠结”和永不休止的紧张对话,促使阎真去寻找能与此相应的审美言说途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就此应运而生。

有必要提到《沧浪之水》的结尾池大为在父亲墓前进行的自我剖析、自我反省、自我问诘。在阎真笔下,池大为进行了近似痛苦的灵魂拷问,并将父亲遗留给他、实际上要他作为精神范本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付之一炬,这实际上昭示着一种价值意义和精神信念的结束。尽管如此,池大为们“成为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12]522}的“被迫”足以说明,作为现实的安居客和精神的流浪者之间的“纠结”仍在:“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对它做出一种准确的描述”^{[12]523}。人物的不安、焦虑、悸动、痛悔,其心灵的轨迹和灵魂的逻辑于此得到纤毫毕现的呈现。也许,正是由于“纠结”形成的精神的既定性和超越性、生存需要与意义诉求之间的张力性关系,让一种心灵的力量平衡着现实的诸般不堪与无奈,使得池大为们具有现代人格的特征,其核心是如何安放人的灵魂的问题。乃至,作者的人文关怀有多深远,其心理现实主义创作就有多深远的意义。或许可以说,心理现实主义在阎真那里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写作态度、美学原则、文学情怀,更是一种观察、把握世界的方式。

问题还在于,阎真小说以“纠结”为构思逻辑的心理化叙事也与其中庸主义的创作心态相关。一方面,阎真认准“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时代,相对主义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没有神圣崇高,一切原则都成为一种说法,成为相对正确的东西”。他一方面确信“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17],其话语逻辑就是实用功利主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功利主义依托市场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18]。另一方面,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力量来平衡。这是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平衡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19]“其实纠结就是一种平衡,如果不纠结了,平衡就打破了。”^{[9]43}

在此，阎真表明了对中庸之道的接受和认可，即用以“责任和良知”为价值准则的理想主义去“平衡”实用功利主义，借用《活着之上》中聂致远的话表述便是：“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12]230}。在“相对主义”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纠结”于是便成了王国维式命题：“可爱者不可信”或“可信者不可爱”——实用功利主义“可信”，理想主义“可爱”。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相对主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阎真并没有把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放置在同等的价值位面上进行考量，而是将两者在价值位面上作出了定位选择——上位是责任和良知，下位是实用功利主义；而中庸之道主张道德价值是多元的、可通约的、和而共同的，要求多元的道德价值观在互相交流、彼此融汇中达到道德价值共识境界。如此看来，阎真式中庸之道本身就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先天性偏向，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在道德理想情怀和实用理性关怀之间，阎真表明了对前者天然的亲和以及对后者本能的警惕。这意味着阎真式中庸之道在宏观性层面的自足性，掩盖不了微观上或逻辑环节上的非自洽性困境。池大为最后在父亲墓前忏悔自己“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12]522}，其实也是对阎真式中庸之道的非自洽性困境的某种隐喻：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处于“无可无不可”状况。所谓“无可无不可”不是说可以没有原则为所欲为，而是揭示了人生抉择中的困境。当生命理想和生活现实相错位，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相反相成时，他们只能在退守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有限度地顺应了功利主义。这当然不是中庸之道的理想境界，理想的境界是“可爱而又可信”。所以，阎真式中庸之道一旦付诸实际性的运用，却不免落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如何是好？”因为，“过”或“不及”通往的都是深渊：要么蒙天舒，要么晏之鹤。缘于此，其所作所为自然连其家人或夫妻间都不能理解。于是，他们总是处在“跟自己过不去”的内心“纠结”中。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池大为在小说结尾站在父亲坟前的心声倾诉：“父亲，我理解你，你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我已经生疏了，而现在又强烈地感到了它的存在。……我的心中也有隐痛，用洒脱掩饰起来

的隐痛，无法与别人交流的隐痛，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12]522}简言之，阎真式中庸之道由于其本身非自洽性的缺陷，只能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20]。在此，“纠结”不但是对他们那种“悬在空中”^{[12]269}存在状态的一种诠释，也是对阎真式中庸之道的审美表述，更是一种现代性焦虑。

三、“纠结”：文本叙述的元话语和结构性要素

从小说叙述艺术角度来看，“纠结”是阎真小说文本叙述的元话语——“纠结”像织布的梭子，通过梭子的运行来编织文本的叙述经纬。叙述依赖“纠结”来展开，情节的演绎凭借“纠结”来推进。具体说，阎真小说的文本叙述除了必要且简约的过渡性陈述，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除了《因为女人》）对话体，将长篇小说的宏伟结构建立在人物对话上。“阎真小说中的物理环境描写非常少见，对事件铺展与人物活动的描述性文字也十分稀少……人物的出场、个性的展示、背景的描述甚至事情的起因、发展、结局，都可以通过人物之间的对白向读者透露他们想要的信息，而不需要作者做阐释性的讲述、说明、议论。”^{[14]56}在对话体的基础上，其小说往往辅之以人物的自诉式、辩白式心理活动。高力伟、池大为、聂致远的人格尊严，柳依依、许晶晶的爱情理想，便是他们展开心理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聂致远就说：“也许，凡俗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不是文化英雄。我景仰他们，可我没有力量走近他们。我只是不愿意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地艰难啊！”^{[12]308}诸如此类的内心告白比比皆是，构成了阎真小说心灵化叙事的“有意味的形式”。阎真小说中举凡出现“知”与“行”的困惑和对不同行为的取舍时，他们的内心就反复地处在撞击中并为此“纠结”不已：一种心声让其按照生存的逻辑和现实轨道行进，不断找出口口让自己堕落；一种心声让其不断地找出理由抗拒世俗的诱惑，坚守信念而追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其中融合着对人生、命运、世界等命题的思考。这种活着“之下”与活着“之上”的矛盾与辩驳实际上又形成了复调形式；复调式心理活动是人物对话在叙述逻辑上

的延伸和扩充,这样能形成故事和议论、情节和抒写的互文性叙述,也构建了阎真小说的基本叙述格局——用小说叙述去展示精神追寻和运行心路历程。这使它又与纯粹的“意识流小说”不同:前者是意识层次的,而且有作者明显的介入,后者是潜意识层次的,作者意识退出;前者是有序且逻辑性很强的,和人物性格、情节、主题是息息相关的,是不脱离现实的;后者是脱离现实,甚至是无逻辑的、不间断的、变换无常的^[21]。

比如《曾在天涯》,就可以作为一部精神历险记来阅读。小说首尾都是抒情化内心告白,阎真以高力伟和林思文、张小禾的对话交往组织叙述来构制文本,其心灵历程简单而通俗地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高力伟心灵上遭遇的“痛苦与欢乐、伟大与渺小、成功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爱与恨……”的感受,精神上的辗转反侧和演变——“多少年来,我在心中嘲笑和拒绝平庸,现在却极为清醒极为深切地意识到平庸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22]557}。这些都被阎真淋漓尽致地铺叙于笔下,其整个文本不时回旋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心声。作为精神历险记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明天我就要结束这种似乎没有尽头的精神流放,加拿大,这是一个好地方,却不是我的心灵的故乡。”^{[22]558}

再如《沧浪之水》《活着之上》,池大为、聂致远于问心无愧与问心有愧之间的“纠结”贯穿始终,不但体现在所做的每件事中,更表现在因“纠结”而引起的心灵煎熬上。这种“纠结”在他们“入局”前如此,“入局”后依然。笔者认同龚曙光先生的以下说法:“入局”前的池大为“抵抗生活的诱惑是主流,反抗成为了他纠结的动力。到后来,顺从生活成为他纠结的动力,但是他时时也在反抗:我不能堕落,我不能腐败”^{[19]43}。至于柳依依、许晶晶,她们的纠结主要聚焦在青春和爱情上:青春是无价还是有价?爱情是存在还是虚幻?正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中,文本的叙述得以铺展、演进和完成。小说的最后,她们似乎醒悟了,却又带着几分若隐若现的执念:“沉默啊,沉默啊,也许,会永远沉默下去,直到时间的深处。在那里,一切都化为乌有,并获得最后的公平。”^[23]总之,阎真小说“在心理与现实之间建立小说叙事的‘通道’,通过心理现实和

社会写实的双重观照,细密、充分、完整地呈现时代语境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困境”^[24]。

设置性格相反相成的人物对应结构,也是阎真小说敷陈“纠结”的叙述方式。比如,池大为和丁小槐,聂致远和蒙天舒,柳依依和苗小慧,许晶晶和秦芳,甚至于夫妻之间(如池大为与董柳,聂致远与赵平平,高力伟和林思文,柳依依和宋旭升),彼此因为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缠搅在一起,又因为价值观的迥异缠斗在一起。比如聂致远和蒙天舒,在社会关系上是同学兼同事,因而有“同”之谊。按理说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二人本应该“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但事实上却是,虽然“道不同”“志不同”,但彼此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利用(蒙对聂)、提携、帮助的“为友”的行为举措。在某种意义上,《活着之上》的文本叙述就是围绕聂、蒙之间的“纠结”谋篇布局做文章,通过对“纠结”的叙述影射“纠结”着的人情世态和世道人心。如果说,聂、蒙之间的“纠结”是家庭之外的社会性“纠结”——“外纠结”,那么,池大为和董柳这对夫妻则是家庭内部或夫妻之间的“纠结”——“内纠结”。相对来说,在《沧浪之水》中,“内纠结”占据了文本叙述相当大的份额。实际上,两人的恋爱时间很短,严格地说,结婚之前彼此之间只能说是相交,结婚之后才是真正的相识;而一旦相识便“纠结”丛生,所谓的恩爱夫妻变成了“纠结”夫妻,“纠结”甚至成为夫妻关系的扭结。在阎真笔下,这种夫妻之间的“纠结”毫无例外是由价值观的迥异导致的;“纠结”又大都通过夫妻对话——更多的是意气之语和辩驳之言,以及池大为在两人话语碰撞后引起的内心活动来表征的。如,在关于什么是“聪明人”和“有出息”的问题上,夫妻俩产生了争论。当董柳说“如今是什么时代,兑现的时代,到了手就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时,池大为内心感慨着:“这话听上去实在没有道理,可又实在有道理。世界变了,道理也换了一种讲法。……我几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了,我当做精神支柱而引以为骄傲的那些东西,其实并没有最后的依据。当终极失去的时候,最后的依据也失去了。”^{[12]248-249}当“纠结”成为人物设置的结构性元素时,那些人物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纠结”去透析当今的

社会心态和时代情绪。

毋庸讳言，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总觉得阎真的小说在叙述上过于繁实、拘泥，结构布局显得有些单调、冗蔓。比如，密不透风的人物对话，具体说是密不透风的“某某说”的直接引语句，总给人一种水银泻地般的感受。其文本的推展亦略显板滞、拖沓，叙述则缺乏应有的权变和张力。其实，在长篇小说的谋篇布局上，适当的空白、闲笔，适时地拉开距离，在不影响整体格局的基础上变换一下叙述技巧，都是有必要的，可以增加叙述的情趣和张力。阎真说他喜欢《红楼梦》，而且也想吸纳《红楼梦》对世情人心的摹写方式。如同曹雪芹写《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阎真写小说也写得很累。值得一提的是，读者阅读阎真的小说也多少感觉有些累。究其原因，以思想容量取胜的小说，借用鲁迅的话就是“忧愤深广”的小说，读起来心情本来就沉重，如果作者在叙述艺术层面也不能提供必要的阅读快感，产生阅读的疲乏感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阎真始终将小说的现实性品格、当代性诉求建基于坚实的叙事心灵化机制之上，这使其创作在心灵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尤其是，他将其全部作品——四言题系列（五部长篇小说）都置于心理现实主义创作中时，就更应该引起论者的重视了。阎真在《因为女人》正文之前的那封“致友人书”中引用的一句古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所谓“心忧”与“何求”，又何尝不是阎真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诉求和创作索求。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因就阎真而论阎真，从而忽略了他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所提供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阎真，赵树勤，龙其林. 还原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生态：阎真长篇小说创作访谈[J]. 南方文坛，2009(4)：62.
- [2] 贾磊磊.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精神的指涉意义[J]. 当代文坛，2016(4)：4.
- [3] 杨丹丹. 从“研究”到“生产”：市场、现实主义文学与《活着之上》[J]. 当代作家评论，2015(6)：81.
- [4] 邱晓丹. 路遥接受史之冷热现象研究：兼论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脉络的裂变与转型[J]. 文学评论，2021(4).
- [5] 路遥.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M]//路遥. 路遥文集：第2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74.
- [6] 张怀久. 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及其理论[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2).
- [7] 徐颖，栗子. “女版《沧浪之水》”面世，作家阎真说：“世俗的生活，就是真正的生活”[EB/OL]. [2024-10-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643187473042742&wfr=spider&for=pc>.
- [8] 顾明，高圣斐. 阎真：贴地而行，写出生活的痛感[EB/OL]. [2024-10-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1613348152035803&wfr=spider&for=pc>.
- [9] 任殿顺，张琴，梁美兰，等. 当代知识分子的纠结与孤愤：龚曙光、阎真对谈实录[J]. 出版人，2015(10).
- [10] 萧夏林. 《活着之上》与第一届“路遥文学奖”：评委原始评语[J]. 文艺争鸣，2015(5)：114.
- [11] 黄伟林. 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及其局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2(4)：63.
- [12] 阎真. 沧浪之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13] 何雪凝. 心理世界的艺术呈现：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
- [14] 余中华. 面对虚无的写作：阎真论[J]. 小说评论，2008(4).
- [15] 于慈江. “活着至上”与“活着之上”的拉锯、纠结与挣扎[J]. 南方文坛，2015(4)：107.
- [16] 侯玲宽. 《活着之上》超越与限度[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71.
- [17] 阎真. 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J]. 南方文坛，2015(4)：109.
- [18] 阎真，吴投文. 对话阎真：坚守知识分子应该有的价值底线[EB/OL]. [2024-10-05]. <https://m.voc.com.cn/xhn/news/201605/14532905.html>.
- [19] 阎真. 总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EB/OL]. [2024-10-05].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5/2015-03-13/236578.html>.
- [20] 杨经建. 中庸之道：阎真小说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J].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2)：135.
- [21] 董晓平. 张爱玲小说与心理现实主义写作[D]. 长春：吉林大学，2019.
- [22] 阎真. 曾在天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23] 阎真. 因为女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553.
- [24] 郑国友. 心理现实和社会写实的双重观照：论《沧浪之水》的叙事特征[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50.

责任编辑：黄声波